

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

The Study of Fei Xiaotong's Social Thoughts

费孝通 &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 研究

丁元竹◆著

学者文丛·社会理论前沿书系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ety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Study of Fei Xiaotong's Social Thought

费孝通 *in His Research Methodology*

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 研究

丁俊明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

费孝通社会思想 与认识方法研究

丁元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丁元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5087 - 1786 - 9

I. 费... II. 丁... III. 费孝通 (1910 ~ 2005) — 思想评论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228 号

书 名: 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 美好社会的世纪求索
著 者: 丁元竹
责任编辑: 邹力新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电 传: (010) 66051713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 作者简介 ◆

丁元竹,现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教授和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曾担任联合国、世界银行等若干国际组织咨询专家。主持国家有关部委委托课题、国际组织课题数十项。曾应邀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和演讲。出版专著《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安全网再造》、《志愿服务在中国》、《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社区发展》(合著)、《走向21世纪的社会问题》、《建设健康和谐社会》(主编)、《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公共服务》(主编)、《问责性、绩效与治理》(主编)、《构建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合著)、《中国2010年:风险与规避》(合著)、《社会发展管理》、China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Social Capital in Asi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agement 等二十多部。在《人民日报》、《瞭望》、《宏观经济管理》、《社会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Hitotsubashi Journal of Economics 等报刊发表论文三百多篇。

目 录

导言 美好社会的探索者	(1)
第一章 “探索中国社会及其出路是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9)
第一节 “探索中国社会及其出路是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9)
第二节 中国社会的发展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中 ...	(17)
第三节 社会思想家的探索不能离开所处的微观和宏观环境 ...	(26)
第二章 “社会绝不是一个各部分都不相联结的集合体”	(46)
第一节 “社会绝不是一个各部分都不相联结的集合体”	(46)
第二节 “文化变异”和“社会变迁”	(52)
第三节 通过理论再现社会	(65)
第四节 通过社区体察理解社会	(73)
第三章 “要充分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	(81)
第一节 从比较简单的社区开始工作:《花蓝瑶社会组织》	(81)
第二节 探索复杂的社会结构:《江村经济》	(91)
第三节 类型与类型比较:《云南三村》	(109)

第四章 在社会理论中把握社会的特点和规律	(120)
第一节 “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乡土中国》	(120)
第二节 “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生育制度》	(134)
第五章 “建立迈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145)
第一节 社会学重建中的批判与继承	(145)
第二节 “建立迈向中国实际的人民社会学”	(154)
第三节 “知识之有别于空想是在其反映客观事实”	(162)
第六章 “行行重行行”	(171)
第一节 “行行重行行”	(171)
第二节 两条源远流长的思想主线	(181)
第三节 从类型比较到模式研究	(191)
第七章 建设人民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	(223)
第一节 社区生活:从人性的异化到人性的复归	(223)
第二节 从社会学中国学派到中国社区建设	(236)
第三节 建设人民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	(247)
第八章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251)
第一节 “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才是第一位的问题”	(252)
第二节 “全球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问题’的全球化” ..	(261)
第三节 “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一个孔子”	(279)
跋 “思想的创造将是一种祷告”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6)

导言 美好社会的探索者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继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在 21 世纪初期提出的又一个伟大战略思想。经过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28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建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社会建设的基本制度框架亟待建立。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社会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最近几年的研究和探索使我体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解决起来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从长远着眼,从现实着手,特别是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作为一个研究者,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研究和谐社会,我主要着眼于公共服务的提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等问题的研究。我曾经写道:“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根据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改革为动力,通过加强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社会公共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实现社会和谐。”^①“和谐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理想,之所以符合历史潮流,是因为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始终是人类文化的核心。”^②“历史、国际经验、理论史和人类近二百年的历史发展表明,社会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和谐、美好的社会是人

① 丁元竹:《社会发展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年 5 月,第 1 页。

② 丁元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要务”,《文汇报》,2006 年 10 月 18 日。

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迫切任务。”^①在研究过程中,随着对问题思考的深入,自己不自觉地就把问题由现实面前拉向深远。因为,我始终记着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从宏观的人类文化史和全球视野来看,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经过很多波折、失误、冲突、破坏之后,恰恰又不得不回到先哲们早已经关注、探讨和教诲的那些基点上。”^②

从长远着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话:思远致远。思远,我认为就是要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地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社会思想史;致远,就是要通过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社会思想的历史来把握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在全球中的位置,在历史和全球化中重新定位我国社会发展和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何打开这样一个视角?

我想到了费孝通教授。

在思想史和社会研究中,很少有人能像费孝通那样坚持不懈地七十多年从事实地调查研究,在实地研究中了解社会。在七十多年的学术活动中,他紧紧地追赶着时代的变迁,并以翔实的资料将其记录下来,探索这种变迁的过程、起因和方向。理论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在以往多注意像黑格尔、王守仁、梁启超等一类思想家的思想研究,很少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思想家的思想历程进行揭示和勾画。探索这类社会研究者的思想发展历程,也许会在理论和思想史研究中辟出一条新的路子,对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它最终可能会告诉人们,人类面对着社会,会有不同的认识方式,因为,思想家并不是都面对同一个社会问题。

从社会思想史入手,研究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思想发展,是发现发展社会规律,发展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有效途径。每一个社会学者的思想发展都是一种认识模式,对于众多思维模式的研究,可以从中找到人类认识社会的共同方式,这对于发展中国社会学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但此项任务复杂艰巨,非一人短期所能及。研究费孝

① 丁元竹:“和谐社会的基本机制、约束因素及对策研究”,《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6卷,群言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通的学术思想是实现上述总目标的一部分。

费孝通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也是一位能够站在时代前列和历史高度洞察社会发展趋势的社会学者。1979年,69岁高龄的费孝通受命恢复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启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作为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费孝通不仅为恢复社会学奔走忙碌,同时也身体力行,深入开展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他不仅深入实地研究,观察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美好社会”就是其中之一。费孝通说:“事实上,自从有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①

“美好社会”体现了一个学者、一个社会学者崇高的认识境界。社会学不仅需要理论和方法,不仅需要对实地的考察和对理论构建的思考,也需要崇高的境界。费孝通是一位拥有崇高境界的学者,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代宗师的根本所在。崇高的境界、敏锐的思想、细致的观察,是学术大师必备的内在素质。

费孝通以其对中国社会的七十多年的实地研究及其成果,奠定了他在中国社会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他丰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思想和理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有幸在费孝通指导下攻读社会学。那时,在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小圈子里有一个惯例,就是,费孝通每写一篇文章总是要拿到北京大学,在有关研究人员和学生中传阅、学习、研讨,大家也可以提出意见。有时,费孝通不顾年迈,亲自到北大与研究人员和学生一起座谈、讨论。这个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写的“人的研究在中

^①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国——缺席的对话”一文,那是费孝通对他伦敦经济学院的老同学利奇(Sir Edmund Leach)博士写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1982)的回应。在“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中,针对不同环境下文化的差异,针对当时世界文化在现实和学术领域的冲突,费孝通提出“我们不仅能容忍而且能够相互欣赏。我们不妨各美其美,还可以美人之美”^①的思想。这是他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之一,那是1990年夏季。这个思想是费孝通从文化角度考虑人类不同文化的和平相处,文化之间的平等问题。文化平等是社会平等的重要内容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核心。进入21世纪,各国人民要求尊重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呼声不断高涨,紧紧依靠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从文化制度入手研究和制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已经提到全球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文化平等是保证人类拥有一个和谐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全球实践证明,仅仅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已经不足以解释恐怖主义在世界上的蔓延,恐怖主义可根植于文化歧视和文化冲突之中。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留校在社会学系工作,经常随费孝通出差。1992年春,我随费孝通到山东曲阜,费孝通访问了三孔——孔林、孔庙和孔府。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孔庙坐了很久。我看得出,他当时是思绪万千。回到北京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1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谈了他访问孔林时的思考和感想,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孔林片思”。在这篇文章中,费孝通说:“海湾战争之后人们已经注意到战争造成了环境污染,认识到了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地球上是否还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这是人与地球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很好地提出来研究,看来人类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觉醒。”^②这时,费孝通已经从对文化的思考进入对整个社会发展的思考,从社会发展这个更广泛的视角透视中国乃至全球发展,考虑环境公平和社会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9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页。

公平问题。

作为一个成功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费孝通从不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考虑问题,而是紧紧追赶时代步伐,与时俱进,不断探索。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人民已经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迈进。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费孝通在“孔林片思”中把他的文化思想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小康之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①。他把这种相处称为人的心态关系,他说:“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共存不一定共荣,因为共存固然是共荣的条件,但不等于共荣。”^②

1993年7月他参加了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英迪拉·甘地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对‘美好社会’的思考”的演讲,将其以往文化平等、环境公平和社会公平思想升华,形成美好社会的思想,这就是“20世纪最后十多年所发生的这些新事物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理解,其中是否得出一种看法,人类大小各种群体是可以各自保持其价值体系,而和其他群体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只要大家不采取唯我独美的本位中心主义,而容忍不同价值信念的并存不悖”^③。政治平等、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文化公平和环境公平等思想在这里得到更进一步升华,成为他的美好社会思想的核心。

1979年,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费孝通领衔在中国恢复社会学,至今已经28年有余。在恢复社会学初期,费孝通就明确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我们建设社会学的方针,正如乔木同志^④所讲的,有三条:一是以马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97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296-297页。

③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65页。

④ 指胡乔木——笔者注。

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这是我们的理论基础和方向;二是结合中国实际,这就是说要有我们自己的内容;三是为现代化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社会学的宗旨。”^①作为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领衔人,费孝通把为现代化服务作为社会学建设的宗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没有辜负费孝通的期望。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社会学在过去的28年有了巨大的发展,与时俱进,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研究,发展出若干新的学科分支,拓展出若干研究领域,孕育出若干重大理论和思想,培养出若干在发展领域具有很大影响的学者。实践证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广阔的空间。在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学还要与时俱进,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美好社会的学问。费孝通个人的人生实践证明,社会学只有贴近中国的社会发展,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才有前途。

费孝通从他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理念得出了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这是社会学在过去28年发展中的一个不能忽视的成果,是社会学发展的崇高境界。这些思想的提出与他能够站在历史和世界发展的高度思考问题不无关系,也说明社会学有能力,也有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发展的学问。正如费孝通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学问是有用的知识”,“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给正确详尽的事实,是研究者的不能尽责^②”。社会学是有用的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学要与时俱进,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同时也要避免空谈,要把崇高的理念变成积极的社会行动。

正如费先生说的:“我们要学会‘美人之美’,像各群体自己的成员那样欣赏和领悟他们所爱好的价值体系。‘美人之美’并不要求‘从人之美’,而是容忍不同的价值标准体系并存不悖。但要摆脱本位中心主义,而采取了多元并存的观点。应用到经济上,是不要阻碍有利于双方的竞争,不采取只图单方面的短期利益的保护主义,而坚持相互开放和机会平等;应用到政治上,首先是要不干涉别的主权国家的内政,不以力服人,而以对话代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9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43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替对抗,平等协商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人类的各个群体还没有融合成一体,而政治和经济已经密切联系的现阶段,也可能就是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们可以力求做到的现实态度。‘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并不矛盾,而是相成的。只要我们能够更上一个层次,大家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完全可以建立起亲密的共同合作相处。”^①

“和谐社会”“美好社会”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谐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自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21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所以,我们当前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美好社会体现了我国发展政策价值取向,可以相信,随着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进程的推进,我国的软实力必将得到大大提高,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取得世界的认同,也需要通过发展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形成对世界的吸引力。正如费孝通所说的:“我们是否有理由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想法,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②所以,和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各种现存的矛盾,而且包括心理层次的问题,即文化价值问题。

2005年4月24日上午9点左右,我正在打点行装,准备赴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接到费孝通教授家人打来的电话,要我们尽快赶到医院。我当时心里一沉,不祥的预感马上笼罩心头。我与爱人匆匆驱车赶到北京医院。费孝通先生住院已经一年有余,一年来,我自己国内外穿梭,一直想去看看先生,有时是医院不允许,有时是自己的时间错不开,所以一直没有如愿。赶到医院,先生的秘书张荣华老师先把我们叫到隔壁的房间,介绍了先生的情况,然后我们来到病房。先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我们摸着先生的手,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2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465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1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27页。

手指肿得很厉害,指尖很凉。我们心里祈祷,希望先生能够很快恢复过来。与先生匆匆一面,我便驱车从医院直奔首都机场,从北京到纽约,一路上一直惦记着先生。从纽约转机到波士顿,住进旅馆即开始与国内联系,得知先生已经在我离开北京医院 12 小时后去世。社会学的一代大师离开了我们。

值得告慰费孝通先生的是,2005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美好社会给予更精辟的概括:“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好社会的提出,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重大发展。从 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到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美好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逐步认识和深化的过程。与以往比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好社会更具有人文内涵,体现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价值体系的统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说的:“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②这里的和谐社会的内涵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是包含了构建社会和民族的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构建将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自己价值体系的民族会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费孝通已经去世,但是他一生追求的建设美好社会的理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变成现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我想这是最值得告慰他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年青一代能够站在历史和时代高度,脚踏实地,像费孝通一样把学问变成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的力量,美好社会的理想就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在希望与历史之间,我们年青一代别无选择。

① 《人民日报》,2005 年 2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2005 年 2 月 20 日。

第一章 “探索中国社会及其出路是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当中,会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思想家,他们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工作,对于“学术的价值”和“以学术为业”提出一些和当代一般人极为不同,但却有着关联的看法,以至于整个看来,他们似乎形成了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在许多场合下,他们又遭到人们的批评。任何一场思想方式的变革,哪怕是仅仅超出了传统一小步,都会引起抨击。20世纪30年代便是这样一个时代,五四运动社会思想的基本假定在其发生后不到10年又受到了重新评估。而在这一重新评估中又出现了影响到现时代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就是用实地研究的方式探索中国的社会及其出路。在五四运动后不久,中国思想界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革,这种情形除非我们回溯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文化特征以及它在19世纪末以来的蜕变,在其他任何时间和空间中是很难找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学者和全体人民都感受到某种深刻的心理变迁,费孝通社会思想和学术风格的形成可以从这些变迁中找到最根本的解释和说明。

第一节 “探索中国社会及其出路是中国人的共同要求”

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曼海姆(Karl Mannheim)曾经说过^①,知识社会学的第一步工作是从被研究者、思想家的一些零散的言论中找到一组融贯一致的基本前提和基本

^① 黄瑞祺:《曼海姆》,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

意图。曼海姆将这项工作称为世界观的重创。他的所谓世界观的分析是指对世界观,即思想风格的时代情景、社会条件进行剖析,从中说明被研究者的思想。曼海姆的这种分析方法适合于分析同一文化中的不同时代的思想,而不适合于跨文化研究中思想家的剖析。费孝通的思想风格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特点可以部分地从他生活的时代中得到说明,但不能得到全部说明。因为,他的思想形成的年代,正是国际上的各种经济、文化、社会思潮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融合的年代。这些不能不在费孝通的思想中留下烙印。因此,我们要说明他与他的影响者,诸如:马林诺斯基、罗伯特·帕克、布朗等人的不同,我们就必须分析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他的一切研究行为总是受限制于他的现实关系,他所处的社会格局,面临的社会问题以及他本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这是他理论和方法活动的社会动因。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家都同时处于大文化结构和小文化结构之中,所谓大文化结构,即他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行为模式;所谓小文化结构,也即学者本人所处的学术环境,学科修养、研究方法及学术信息资源。文化人类学者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同视野,由于学者的文化背景与其互为因果,因而变得纷繁复杂。

费孝通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踏上社会研究的征程的。这恰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革命时代。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和科学运动唤起了中国人对自己的审视,到20世纪30年代已经由表层深入到内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三次论战和“新启蒙运动”中看到。但思想上的批判并不能代替行为上的批判。而且行为上的变革绝不是立刻发生在思想变革之后,它往往发生在思想变革的许多年之后。那些思想革命的先驱者也依然会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和行为之中深深地打下那个社会结构的烙印,甚至表现在他们思想和理论的出发点和基本假定上。20世纪初以来,费孝通等老一辈中国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既可以从那个时代的变革中找到它的影子,又可以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及其结构,甚至在东方文化及其结构中看到它的影子。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穆尔(Charles A. Moore)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在人生观上,东方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一元论倾向,东方思想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这一倾向不仅存在于中国的哲学体系(如